



傅兰雅《译书事略》的目录学解读*

□傅荣贤

摘要 英国人傅兰雅 1880 年的《译书事略》是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的译印图书目录。该目录首次对西书独立编目,从而完成了对“西学”的书目确认:西学是不同于传统中学的另一个学术体系。《译书事略》还通过著录、分类等书目要素,揭示西学的学科化性质以及“力今”“胜古”的求新指向,成为梁启超《西学书目表》等中国人所撰西学书目的前驱。

关键词 傅兰雅 《译书事略》 近代目录学

分类号 G257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19.02.017

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 年) 1880 年发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简称“《译书事略》”),前有《序》,正文分四章。第一章“论源流”记述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简称“翻译馆”)的成立经过,第二章“论译书之法”论及译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第三章“论译书之益”讨论翻译西书对中国近代化的意义;第四章“论译书各数目与目录”以目录的形式著录翻译馆译刻的西学图书。

翻译馆与北京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是 19 世纪下半叶中国的三大官方译书机构,其中又以翻译馆译刻西书的成就最大。甲午战争后,强学书局(1895 年)、商务印书馆(1897 年)等机构,“编译出版的西书,无论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这样,翻译馆才在西学传播中失去了中心地位”^[1]。因此,《译书事略》不仅是研究江南制造总局的重要文献,也是分析洋务运动时期“西学东渐”的第一手材料。这也意味着,对第四章“论译书各数目与目录”的研究主要是从学术文化的角度立说,而没有从目录学的学科视域认读。例如,费正清指出,翻译馆 1871 年刊刻的布国(德国)希理哈《防海新论》所述防海理论,在李鸿章、李宗羲、刘坤一、丁宝楨四位督抚的章奏中皆有出现^[2],可见翻译馆译刻西书影响之一斑。

然而,“论译书各数目与目录”的价值首先是目录学意义上的,本文拟重点分析其目录学的内容和性质,在此基础上揭示其在中国近代目录学史上导夫先

路的首创地位。由于《译书事略》分 4 期发表于《格致汇编》1880 年第 5 至 8 卷,笔者在标注引文时亦不相混同,分别以四篇参考文献列出。《译书事略》的目录学内容主要体现在第四章“论译书各数目与目录”中,可从著录范围、著录内容、分类等方面予以分析。

1 著录范围

翻译馆 1868 年始译西书,但 1871 年才印成《运规约指》《开煤要法》二书。“论译书各数目与目录”即著录了从 1871 年到“去年西六月终”^[3](1879 年 6 月底)翻译馆译印的西学书籍。作者首先分类统计“各门等书”已刊成者、尚未刊者、未译全者、已译全者的具体数量,表 1 摘录前二类书及其“总共”情况,以例其余。

表 1 “各门等书”已刊成者、尚未刊者、未译全者、已译全者举例

各门等书	已刊成者	尚未刊者	未译全者	已译出者
算学测量等书	二十二部 计五十二本	二部 计八本	三部	计五本
汽机等书	七部 计十七本	三部 计六本	一部	计二本
总共	九十八部 计二百三十五本	四十五部 计一百四十二本	十三部 计已译出三十四本	

* 2018 年江苏省双创人才文化创新类“古典目录的学术史书写与学术秩序建构研究”成果之一。
傅荣贤, ORCID: 0000-0002-0696-544X, 邮箱: frx99@163.com。



作者将这批西学书籍“分成三类，胪陈于后”，“第一类为已刊成出售之书名与撰书人名及中西译书人名，并刊书年岁与每书本数及每书价钱”^[4]，共 98 种。表 2 为该二种书之举例。

表 2 “已刊成出售各书”举例

各书目录	撰书人名	译书人名	笔述人名	刊书年岁	每书本数	每书连史纸价钱
一 运规约指	英国白起德	傅兰雅	徐建寅	一千八百七十一年	一本	二百四十文
二 代数术	英国华里司	傅兰雅	华蘅芳	一千八百七十二年	六本	一千二百八十文

“第二类为已译成而未刊之书”，共 45 种，“内有将待刊者，亦有仅为初稿者”^[5]。这 45 种文献接续前 98 种，所以序号从“九九”开始。表 3 为该二种书之举例。

表 3 “已译成未该各书”举例

各书目录	译书人名	笔述人名	约成本书
九九 决疑数术	傅兰雅	华蘅芳	四本
一百 代数总法	傅兰雅	华蘅芳	四本

“第三类为未译全之书”^[6]，共 13 种，接续第一类 98 种和第二类 45 种(98+45=143)，故序号始自“百四四”。表 4 为该二种书之举例。

表 4 “尚未译全各书”举例

各书目录	译书人名	笔述人名	原有本数	已译本数
百四四 奈端(牛顿)数理	傅兰雅	李善兰	八本	三本
百四五 造汽机等手工	傅兰雅	徐寿	六本	二本

总体而言，《译书事略》的书目著录范围具有下述四个主要特点：

(1) 首次以书目的形式确认“西学”的独立地位

梁启超曰：“‘西学’名目，实自耶稣教会入来所创始。”^[7]《四库总目》中即收录了利马窦等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的《西学凡》《西学齐家》《修身西学》《西学治平》等著述。从目录学的角度来看，“明清之间已有韩霖、张虞撰《道家学传》，于各教士传后列举其所著译之书名，附刊于《圣教信证》之后，清末王韬重刊此传，改名《泰西著述考》”^[8]。《道家学传》(《泰西著述考》)是以 92 名明末清初传教士的传记为主，传下附录其著译图书(总计 210 种)，并不是严格的分类目录。例如，在简介利马窦生平事迹后，罗列其“所著各书”从《天主实义》到《圆容较义》计 15 种^[9]。换言之，该书重在人物传记，书目只是作为传主生平

事迹的一部分而被附录其中。因而，与其说是对“西学”的书目确认，毋宁说是对西方传教士(即所谓“道学家”)独立身份的确认。

《译书事略》忆及 1867 年，徐寿、华蘅芳“二君在局内为帮办之员，志尚博通，欲明西学”。又曰：“(徐寿)决意久居上海，以便与西士考证西学……徐寿到局，旋请局中冯、沈二总办设一便考西学之法，至能中西艺术共相颉颃。因想一法，将西国要籍译出。”^[10]他的《译书事略》正是以“将西国要籍译出”的“西学”书籍为主要对象独立编制的目录，从而也首次以书目的形式完成了对“西学”的确认：西学是不同于传统中学的另一个学术体系，“西学之源”“中体西用”皆非的论。姚名达尝曰：“此表(《西学书目表》)重西学而轻东学，其弊正与《日本书目志》之有东籍而无西籍相同。故徐维则又撰《东西学书录》……此外复有学沈兆祜《新学书目提要》。”^[11] 1903 年王景沂又有以“科学”命题的《科学书目提要初编》出版。这批中国人编撰的书目，其“西学”“东西学”“新学”“科学”名相变化的背后，无疑共享一致的学术认知：以正经、正史为核心的传统四部并非唯一的知识类型，西学知识具有独立的价值及其合法性。可以认为，正是这批书目的前后继踵，“西学”才得以正名：西学不仅不再是“夷技”，甚至获得了深具褒义内涵的“新学”“科学”之尊号。

(2) 中国人的“西学”创作

《译书事略》以翻译馆特定时间内译、刊的西学书籍为对象，但这批西书并非皆译自西人的西文原著。如表 5 所示，《译书事略》“所刊之书”中有 5 种中国人的汉文西学著述。

表 5 中国人的汉文西学著述 5 种

各书目录	撰书人名	刊书年岁	每书本数	每书连史纸价钱
十四 勾股六术	钱塘项名达梅侣稿	一千八百七十四年	一本	一百八十文
十五 算学启蒙	朱氏	一千八百七十四年	二本	四百八十文
十六 算法统宗	程大位汝思	一千八百七十六年	四本	七百文
十七 九数外录	金山顾观光尚之著	一千八百七十六年	一本	一百八十文
六十 三才纪要		一千八百七十一年	一本	三百文

另外，该目还存在“误翻刻书如《算学启蒙》《九



数外录》等为译书等问题”^[12]。当然,《算学启蒙》和《九数外录》(见表5的“十五”和“十七”)并未致误,故二书之后亦未列出“译书人名”和“笔述人名”。但《译书事略》确实存在“误翻刻书为译书”的情况,见表6。

表6 “误翻刻书为译书”7种

各书目录	撰书人名	译书人名	笔述人名	刊书年岁	每书本数	每书连史纸价钱
十一 数根开方术	行素轩算稿	华蘅芳		略	略	略
十三 量法代数	则梅山房	贾步纬		一千八百七十五年	略	略
十八 弦切对数表	数理精蕴	贾步纬		略	略	略
十九 对数表	数理精蕴	贾步纬		略	略	略
二十 八线简表	数理精蕴	贾步纬		略	略	略
二一 八线对数简表	数理精蕴	贾步纬		略	略	略
二二 八线对数全表	数理精蕴	贾步纬		略	略	略

表6所列7种文献是典型的“误翻刻书为译书”。其中,第十一种《数根开方术》是华蘅芳的个人著述,收入华氏《行素轩算稿》数学著作集。傅兰雅误作品集“行素轩算稿”为撰书人,误“华蘅芳”为译书人。第十三种《量法代数》是贾步纬的个人著述,“则梅山房”是其书斋名,今上海周浦镇有“则梅山房”(贾步纬故居)景点,为历史文化保护单位。该书初版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书名页又题“周浦则梅山房数学”^[13],翻译馆翻刻于1875年,傅兰雅误“则梅山房”为撰书人,误“贾步纬”为译书人。《数理精蕴》即《御制数理精蕴》,清帝康熙编制于五十二年(1713年),雍正元年(1723年)刻成。“该书汇集了自1690年之后输入中国的西方数学知识,并吸收了当时中国数学家的一些研究成果”^[14]。表6序号十八至二二计5种文献都是从《数理精蕴》中择取单行本翻刻而成,它们都不存在“贾步纬”作为译书人的问题。

综上,表5前四种和表6全部七种文献都属于“算学测量”类,这无疑也是中国人西学创作的主要领域。表5中的第五种(序号六十)《三才纪要》列入“博物学”,从该类所收《声学》《光学》等文献来看,“博物学”实即物理学,而《三才纪要》是“关于人天地(三才)的宏观论述,严格来说属于社会科学的范

畴”^[15]。但不管怎样,说明中国人的“西学”创作,也得到了傅兰雅一定程度的认可。“西学”与其说是基于学术主体(中国人或西方人)的区分,毋宁说是从学术内容(研究对象)的角度着眼的。因此,傅兰雅所谓“论译书各数目与目录”,严格来说应该叫“论译、刻西学书各数目与目录”。亦即,该目既包括“译”自西方的图书;也包括直接列为“刻”或“印”的对象的中国人所著西学内容的汉文图书。并且,从类目设置及其文献分类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的著述皆随部入类而未独立编目,似乎在暗示:中西学者在西学文献的生产上地位平等,并无轩轻之别。

受其影响,1896年梁启超《西学书目表》以降的“西学”“东西学”“新学”“科学”目录亦以内容上讲西学的文献为对象,中国人涉及西学的著述多有收罗。惟所不同者,《西学书目表》正表著录“通商”以来(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和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通商口岸)所译西书“略三百种”,“中国人著书言外事,其切实可读者,亦略有数十种”^[16]则厕在“附卷”;1902年徐维则、顾燮光《增版东西学书录》亦以附录的形式著录“中国人辑著书”等等,事实上是强调:西人是西学文献生产的主体,中国人虽亦参与西学文献的生产,但实际成就则远逊于西人。

(3)“西学”具有面向未来的时间指向

严复曾将“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17]视为中西学术差异之一。“好古”,所以“法先王”、以先王之是非为是非;“力今”,所以“法后王”、以进化的观点看待学术的发展。《译书事略》虽以“去年西六月终”为时间断限,但以“力今”“胜古”为取向,十分注意网罗最新的西学成果。

首先,著录报刊等连续出版物。

今天的图书馆目录多将图书和报刊作为两种文献类型分别编目,但“论译书各数目与目录”是包括“新闻纸”的。傅兰雅指出:“新闻纸与《近事汇编》等随时所印之书”,“每若干时则印三百至五百本,分呈于上海及各省官员。”^[18]连续出版物具有“随时所印”的特点,能够即时反映西方新事、新理、新法的“最新”成果,这是作为图书目录的《译书事略》专辟“年代表、新闻纸”类目并著录6种相关文献的主要原因,见表7。



表7 “年代表新闻纸”类文献6种

各书目录	撰书人名	译书人名	笔述人名	刊书年岁	每书本数	每书连史纸价钱
九三 四裔编年表	英国博那	林乐知	严良勋 李凤苞	一千八百七十四年	四本	一千七百五十文
九四 列国岁计政要	英国麦丁 富得力	林乐知	郑良棧	一千八百七十八年	六本	一千四百文
九五 西国近事汇编		金楷理	蔡锡龄	一千八百七十三至七十七年	十三本	一千七百文
九六 西国近事汇编		林乐知	蔡锡龄 郑良棧	一千八百七十八至七十九年		
九七 新闻纸		金楷理		一千八百七十八至七十九年		
九八 西事撮要		金楷理		一千八百七十九至七十九年		

第一种《四裔编年表》是“专门介绍西方历史的年表体著作”^[19]；第二种《列国岁计政要》“是世界各国与施政有关的重要事项的年度统计”^[20]，它们都属于“年代表”的范畴。因二书具有逐年记事或统计的性质，与另外4种属于连续出版物的“新闻纸”（报刊）相似，故而聚合为类。作为连续出版物，《西国近事汇编》（2种）、《新闻纸》和《西事撮要》（各1种）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刊书年岁”并非某具体年份，而是从某年至某年的连续年份。其中，“《西国近事汇编》是近似于报纸而更接近于期刊的周刊”^[21]，如表7所示，序号九五、九六虽书名（实为刊名）相同，但“刊书年岁”前者为“一千八百七十三至七十七年”，后者接续为“一千八百七十八至七十九年”，故视为两种文献，分别著录为两条款目。由于《译书事略》截止1879年6月底，后者尚未最终成编，所以“每书本数”与“每书连史纸价钱”两项内容皆付阙如。第九七种《新闻纸》即报纸；《西事撮要》未解何物，但1833年传教士马礼逊尝撰《英事撮要》，“是十九世纪前半期介绍西洋制度”的译著^[22]。据此，《西事撮要》当为西国政事之荟要，该书“刊书年岁”为“一千八百七十九至七十九年”，即从1879年到1879年，作者不径称“一千八百七十九年”，正是要强调其连续出版的性质。

受其影响，后世西学书目皆重视对报刊的网罗

和著录。如徐维则即曾倡言：“欲知各国近政，必购阅外报，英之《泰晤士报》及《路透电音》，日本之《太阳报》《经济杂志》，于各国政要已具大略，盖仿西人传单之法，排日译印，寄送各官署，兼听民间购买，以资阅历。”^[23]相应地，该书目亦列有“报章”类，著录了《杭州白话报》《苏州白话报》《普通学报》等报刊。

其次，强调西学的趋新特征，注意书目的续编工作。

傅兰雅每言“西国所出格致新书”：“内有数卷太略且近古，所有新理、新法多未列入”；又曰：“盖利马窦诸人著格致书后，越有二百余年，此时内泰西格致大兴，新理迭出，而中国尚未之知也。”^[24]正是意识到西学的“新理迭出”，《译书事略》不仅著录“已刊成出售之书”（如表2所示），亦著录“已译成未刊之书”和“未译全之书”，表4“百四五”《造汽机等手工》似尚未最终确定书名，亦得见著于录。嗣后西学书目，亦多将“未刊之书”列出。《西学书目表》附卷即有《近译未印各书》，梁启超曰：“其未译成及已佚者，皆附见。”如《分光求原》注曰：“未译成。”^[25]《东西学书录》及其增版亦延及“未刻”“未成”之书，如《物理推原》提要，“东亚书局译有《近世物理论新编》，未出”^[26]；《植物图说》提要，“益智书会印有傅兰雅《植物利用》，未出”^[27]。集中反映了作者“西人之学以知新为贵，故新书日出无穷，有昔为珍秘，今视为尘羹土饭者”^[28]的西学认知。

傅兰雅还说：“局内译书之事虽经十有余年，亦仅为开创之初。”^[29]又说：“近来西国所出新格致书，拟再续购存储。”^[30]他还发愿：“中西久无交涉，所有西学不能一旦全收，将必年代迭更，盛行格致，则国中之宝藏与格致之储才始能焕然全显。”^[31]表明翻译馆的译、刊工作并不停留在“去年西六月终”，而是一个指向未来的未竟事业。相应地，具有明确时间断限的《译书事略》乃是一个“当下”性质的、因而有待补充的书目。翻译馆的译印目录事实上亦赓续不绝，构成了一个著录系列，主要包括：①1902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书目》；②1905年魏允恭编《江南制造局记》卷二所列“图书目”；③1909年陈洙等编《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铅印本；④1909年《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⑤1911年《上海制造局译印图书目录》，等等^[32]。这种在时间上刻意接续前者，从而网罗翻译馆全部译刊文献的意识，对《西学书目表》以降的西学书目影响很大。例如，1899年出版的《东西学



书录》主要增补 1896 年《西学书目表》以来截止 1899 年的东西学著述,1902 年《增版东西学书录》则主要增补 1899—1902 三年中“又得新书数百种”^[33]的东西学著述。后者还列出《广问新书之概则》,针对“新籍愈多,财力未大,居地既僻,闻格又限,再期增广,难乎其难”的现状,作者“爰动广问之思”“特拟《概则》如左:我国志士及各地编译局所素有爱力,具见热心,凡平时目见、手自译著为拙录所未收者,随笔提要,络绎邮寄,或拙录讹略,实力指示,积日成帙,少则再为增补编印以行,多则改为《图书世界》一册,以为国民教学之前导”^[34]。

(4) 关于客观著录与主观选择的辩证关系

类似于“有其书则著于录”的藏书目录,翻译馆“已刊成”“尚未刊”“未译全”的全部 156 种(98+45+13)文献,是书目著录的“客观前提”,书目作者并没有主观“选择”的余地。例如,《译书事略》提及南京书局刊印的“利马窦与伟烈亚力所译《几何原本》及伟烈亚力之《代微积》并艾约瑟之《重学》”^[35],因非翻译馆所译印,故未见著于录。

另一方面,作为“客观前提”的“至于所译各书若何、分类若何选择”^[36]的定夺,则是主观选择的结果。一个显例是,“初译书时,本欲作《大类编书》(大英百科全书)”,但考虑“内有数卷太略且近古,所有新理、新法多未列入,故必察更大更新者始可翻译。后经中国大宪谕下,欲馆内特译紧要者”^[37]。文中还提到“李中堂数次谕特译某书”,出于对“中国大宪”意志的趋附,翻译馆“平常选书法,为西人与华士择其合己所紧用者”^[38]。所谓“紧要者”或“紧用者”,主要是格致、制造,即自然科学与技术,尤其指与军工有关的学理与技术,可从表 8 所分类目窥其一斑,而这也与洋务派出于“自强”动机的西学诉求合若符节。正如李鸿章所云:“最要为算学、化学、汽机、火药、炮法等编,因属关系制造;即如行船、防海、练军、采煤、开矿之类,亦皆有裨实用。”^[39]

总之,翻译馆“译、刊什么图书”是主观判断和选择的结果,但就“论译书各数目与目录”而言,它只是对译、刊(包括拟译、拟刊)文献的客观记录。同样,《西学书目表》以降的西学书目以特定时空下实际存在的西学书籍为范围,努力“曲尽无遗”或“网罗殆尽”,因而在著录范围上亦鲜有主观价值的介入。

2 著录内容

由表 2 可知,已刊成出售之书的著录内容包括书名、撰书人名(原作者)、译书人名、笔述人名、刊书年岁、每书本数及每书价钱共 7 项。但针对不同的图书,7 项内容又每有变通。例如,表 3“已译成未刊之书”45 种和表 4“未译全之书”13 种皆非汉文出版成品,故未列出“刊书年岁”和“价钱”,且“撰书人名”信息也省略了。又如,表 5“中国人的汉文西学著述”五种图书则没有“译书人名”和“笔述人名”信息。再如,第十二种《开方表》没有“撰书人名”和“笔述人名”;第五十八种和五十九种皆为《光学》(附视学诸器说),但作者分别为英国田大里和英国西里门,故作为不同文献,分别著录为两条款目。

7 项内容中的“译书人名”和“笔述人名”反映了当时“西人与华士同译”的现实,即西人“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语,华士以笔述之”。华人还负责“将(译成)初稿改正润色,令合于中国文法”^[40],更好地满足中国读者的需要。

“每书价钱”一项表明该目是营业目录,即“图书翻译出版、发行以及旧书业为介绍推销图书而编成的统计登记”^[41]。《西学书目表》亦标注“价值”,如史志类的《万国史记》五角,《万国通鉴》一元^[42]。《日本书目志》亦然,如植物学类《日本植物名汇》二圆,《植物学语钞》二角^[43]。“《农务要书简明目录》甚至还标明了美元价值,以便读者向国外购求”^[44]。但总体上,《增版东西学书录》《译书经眼录》《新学书目提要》《西学书目答问》等皆不标注“价钱”或“价值”,表明这批书目正在由营业书目向推荐和导读书目的方向发展。

值得指出的是,《译书事略》7 项著录内容中没有“圈识”“识语”乃至提要等旨在进一步介绍内容、判定价值的文字,说明《译书事略》主要定位在供“检阅”的书目工具层次之上,基本属于客观主义的形式目录,鲜有主观介入的动机。姚名达指出:“中国古代目录学之最大特色为重分类而轻编目,有解题而无引得。”^[45]解题“把文本视为体验的对象,努力追求‘写意’的效果,具有明显的主体维度”^[46]。《增版东西学书录》《译书经眼录》《新学书目提要》等后世书目普遍运用提要之体,既简介图书作者和内容,亦揭示其价值所在。《西学书目表》虽无解题,但有“圈识”“识语”,两者配合而行、相得益彰。如《西算启蒙》无圈识,识语曰:“太浅,不必读。”^[47]《谈天》有三



个圈识,识语曰:“最精善。”^[48]另外,梁启超还在《读西学书法》中以例证的形式,选择性地为个别西书撰写了内容精审的提要。如“《泰西新史揽要》初名《泰西近百年大事记》,述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49]。

显见,《西学书目表》以降的中国学者所撰西学目录虽然继踵傅兰雅《译书事略》,但亦承续传统书目的解题,用明确的导向性话语介入对文献及其背后文化的认知,并不恪遵《译书事略》客观主义的书目路径。

3 分类

前述《道家传记》(《泰西著述考》)将书目附于人物传记,书目本身并未分类。《译书事略》是中国近代第一部迥异于传统四部体系的分类目录。

(1)从宏观上分析了西学的主要门类

傅兰雅说:“中国自古以来最讲求教门与国政,若译泰西教门与国政则不甚难,况近来西国所有格致门类甚多、名目尤繁。”^[50]这里,教门即宗教,国政即经世致用的人文社会科学。格致又有广狭之分,广义的格致包括自然科学(狭义的格致)和应用技术(制造)两大门类,所以,《译书事略》每言“制造与格致”,如曰:“两江总督稽察两省才能之士能通晓制造与格致之事者,举为国用……令考究泰西制造与格致所有益国之事。”^[51]格致和制造,一为学理一为应用,故又称“新理、新法”,如曰:“徐君父子(寿、建寅)……屡至上海搜求西国新理、新法。”^[52]他认为,不同于中学的西学,总体上包括教门、国政与格致三大板块,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对西学“学、政、教”三分的宏观认识正是缘此而来。但傅兰雅以翻译馆译刊的“西学”文献为著录对象的《译书事略》,主要由“制造与格致”组成,他相信:“把科学著作译介给中国人,对那些在中华帝国寻求利益的外国人兴办的慈善事业中,无疑是最有效的工作。”^[53]他属意的“科学著作”,主要即是指广义的格致。“惟冀中国能广兴格致,至中西一辙耳”^[54],既是他真实心声的写照,也迎合了洋务官员“制器为先”的西学需求。

梁启超认为:“夫政法者,立国之本。日本变法,则先变其本,中国变法,则务其末,是以事虽同而效乃大异也。”又曰:“今日之学,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政学之用较广,艺学之用较狭。”^[55]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他的《西学书目表》突破了“制造与

格致”的范围,专列“西政”一级类目,下分史志、官制、学制、法律、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10小类。嗣后,《东西学书录》等无不重视“西政”文献的著录及其类目的细分。

(2)以西方式的学科化为分类原则

表8 “论译书各数目与目录”
分类类目及各类文献已刊和未刊之数

序号	类别	已刊数	未刊数
1	算学测量	22	2
2	汽机	7	3
3	化学	5	1
4	地理	8	0
5	地学	5	0
6	天文行船	9	3
7	博物学	6	4
8	医学	2	1
9	工艺	13	9
10	水陆兵法	15	9
11	新闻纸、年代表	6	1
12	造船	0	3
13	国史	0	5
14	交涉公法	0	2
15	零件	0	0
总计		98	45

表8所示15个类目虽缺乏相对完整的体系且各类收书不均,但傅兰雅将“已刊”“已译未刊”和“未译全之书”的翻译馆书籍“依各门之学而列一表”^[56],是完全根据“各门之学”的学科化原则分类的。他说:“所译者多零件新书,不以西国门类分列。”^[57]事实上,15个类目中,除“零件”之外的类名基本都是西方学科化的名目。相比而言,《四库全书总目》和1875年张之洞《书目答问》等书目以著录中籍为主,个中偶涉之西学文献,是被安插在经史子集四部(张之洞增益“丛书”为五部)框架之下的。例如,在《书目答问》中,《新译西洋兵书》五种入子部兵家、《泰西水法》六卷入子部农家、《新译几何原本》十三卷《续补》二卷入子部天文算法,说明西学是中学之“体”体系下的“用”。

随着“东西洋诸学子所著,愈出愈新,莫可究诘,尤非四部所能范畴”^[58],西学图书到底如何分类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学者。而《译书事略》是近代完



全根据西方学科化原则分类的书目,其启发意义在于:既然西学是不同于中学的独立体系,西书就不能被纳入针对中籍才具有合法性的四部体系。嗣后,《西学书目表》等西学书目正是以学科化原则为立类标准的。用学科化的类目分类西籍,这一思路的近代性不言而喻,但也以书目分类的名义切断了中西二学的关联——两者各自独立,不相闻问。

(3) 学与术的判分

傅兰雅屡言“格致与制造”“新法与新理”,事实上是将西方广义的格致区分为学理(狭义的格致)和应用技术两个方面,表8中的第一个类目“算学测量”就是算学(学理)和测量(应用技术)的结合。徐珂《清稗类钞》曰:“无锡徐雪村(徐寿),精理化学,于造船、造枪炮弹药等事,多所发明,我国军械既赖以利用,不受西人之居奇抑勒。顾犹不自满,进求其船坚炮利工艺精良之原,始知悉本于专门之学,乃倡议翻译泰西有用之书,以探索根柢。”^[59]梁启超亦云:“制造局首重工艺,而工艺必本格致。”^[60]可以肯定,徐珂、梁启超对学理(学)和技术(术)的判分,是符合傅兰雅的认识的。但因傅氏书目只有15个类目,所以他的“格致与制造”或“新法与新理”二分的认识未能在类目中显现殆尽。事实上,中国古代即有学术二分的思维,这与传统哲学的“道器观”密切相关。例如,清人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中的“学”主要是虚理,“术”主要是实事^[61]。但章氏又从道器的角度对虚理、实事予以分辨,如其曰:“(《汉书·艺文志·兵书略》)权谋,道也;技巧,艺也。以道为本,以艺为末,此始末之部秩也。”^[62]

傅兰雅学术二分的思路虽未充类至尽,但对后世西学书目影响很大。例如,《西学书目表》不仅认为“一切政皆出于学”,即具有现实操作性的“实事”之“政”源出于“虚理”之“学”,故《西学书目表》先学后政;而且,“门类之先后,西学之属,先虚而后实,盖有形有质之学,皆从无形无质而生也。故算学、重学为首,电化声光汽等次之,天地人(谓全体学)物(谓动植物学)等次之,医学、图学全属人事,故居末焉”^[63]。这样,“西学”各门类遂呈现为一个层次分明、逻辑清晰的统一体系,从而也深化了对西学及其具体科目的认识。这种对西学之学理与实事二分体系的建构,也成为《东西学书录》等后世西学书目效法的主要原则。

(4) 因书设类

傅兰雅对“西学”体系虽有相对完整的认知,但翻译馆主要聚焦于广义的格致,并围绕与军工有关的学理与技术而展开图书的译印工作,这既是《译书事略》的编目前提也决定了它可能的类别选择。由此导致的“因书设类”,既使类目设置缺乏学科系统性,也带来了各类目实际著录文献数量的多寡不均。

首先,缺乏学科系统性。

西学虽然包括教、政、格致三大类别,但翻译馆为了迎合洋务派“自强”的诉求,主要译刊并著录了广义的格致类西书。虽然“西国所有格致门类甚多、名目尤繁”^[64],但表8所列15个类目远远不能包举格致的所有门类。傅兰雅指出:“平常选书法为西人与华士择其合己所紧用者,不论其书与他书配否,故有数书如《植物学》《动物学》《名人传》等,尚未译出。”^[65]所以,植物学、动物学、人物传记等类目皆不见胪列。另外,“博物学”类目实际收录《声学》《光学》(2种)、《三才纪要》《电学》《格致启蒙·格致》6种文献,实为物理学及其各分支学科,但因各分支门类所收文献颇少而没有列出声学、光学等小目。梁启超认为:“制造局首重工艺,而工艺必本格致,故格致诸书,虽非大备,而崖略可见。”^[66]这一判断是立足于1896年他编制《西学书目表》的年份,而非指1880年傅兰雅撰写《译书事略》之时。

嗣后,《西学书目表》将所收西书分为学、政、杂三类,三者又分别细分为13、10和5小类;《增版东西学书录》的正文将所收“东西书”分为31大类,许多大类再复分83小类,另以“附”的形式列出小类6个。如正文中,史志第一下分通史、编年、古史、专史、政记、战记、帝王传、臣民传;政治法律第二下分政治、制度、律例、刑法。显然,后世书目对西学类目的划分日趋完善,不仅“格致与制造”的细分益趋合理,也补充了《译书事略》所缺失的“西政”类目。

其次,既有类目的文献数量不平衡。

诚然,官方主导的洋务派文化战略决定了翻译馆译印图书的对象范围,后者又是《译书事略》类目设置的前提,并决定了各类目图书的数量。傅兰雅曾曰:“另有他书虽不甚关格致,然于水陆兵勇武备等事有关,故较他书先为讲求。”^[67]因此,如表8所示,算学测量(22/2)与医学(2/1)两个类目实际著录文献数量即多寡悬绝;造船(0/3)、国史(0/5)、交涉公法(0/2)等类目皆未有已刊成品,但又各有数量不等的待刊之书,则典型地反映了译印先后的刻意选



择。如果说,造船类“已刊”和“未刊”文献之比为0:3,是因为“造船方面的技术过于专门化,西方译员也不是专业技术人员,他们也需要一个学习过程”^[68],而跟作者对“造船”文献重要性的认识关系不大;国史(0/5)、交涉公法(0/2)皆未有译成之作而只有待译西文原书,则直接与作者对两类文献“紧要”性的判定有关。

(5)空列类目以弥补“因书设类”导致的类目有限性

《译书事略》15个类目的最后三类,皆只有西文原著而无汉译成品,有些甚至尚未着手翻译,但傅兰雅亦预设了类目,见表9。

表9 国史等三类未刊、未译之书

各门等书	已刊成者	尚未刊者	未译全者	已译全者
国史等书	○(部)计○(本)	五部 计十八本	○(部)	计○(本)
交涉公法等书	○(部)计○(本)	二部 计二十六本	○(部)	计○(本)
零件等书	○(部)计○(本)	二部 计二本	○(部)	计○(本)

表9所列,预示着翻译馆对西学书籍的译、刊,是有一个永续不息、值得持续期待和关注的过程。显然,傅氏书目既立足现实,亦放眼未来,具有较长远的前景规划,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书设类”而导致的类目有限性,这对后世西学书目同样具有深刻的影响。例如,《西学书目表序例》在总结“(制造局)惟西政各籍,译者寥寥,官制、学制、农政诸门,竟无完帙”后,指出:“今犹列为一门者,以本原所在,不可不购悬其目,以俟他日之增益云尔。”^[69]亦即,官制、学制、农政等虽尚无对应文献,但都在“西学”范围之内,故亦列出其目。又如,赵惟熙《西学书目答问》“法学”类目下,作者指出:“凡公法、律例、赋税、度支、条约、章程悉宜隶此,惟译本只有公法、律例数种,余未及也。”^[70]表明“法学”及其所分小类虽不实际收书(或仅收“数种”),但亦空列其目,从而达到对“西学”学术版图的相对完整的勾勒。空列其目或“购悬其目”本质上是从西学“实际有什么”到“应该有什么”的认知转变。降及《增版东西学书录》,《西学书目表》“购悬其目”的类目和相关文献,大多得到了补充。不仅如此,后者还增加了诸如“理学”等前者所不备的类目,且有进一步的细目划分,反映了从1896年《西学书目表》到1899年的《东西学书录》再到1902年的《增版东西学书录》,西学文献在品种和数量上的增益。

“因书设类”意味着类目设置直接由实际著录的

文献品种和数量决定,而《西学书目表》以降的后续书目,一方面实际著录的文献品种和数量呈现累积性增长之势,如1896年《西学书目表》正表著录352种、附卷著录293种,“国史”“交涉公法”等《译书事略》尚无实际汉译成品的图书皆得到了补充,如“国史”(梁启超改为“史志”)即著录了28种;另一方面,“购悬其目”又突破了“因书设类”的局限,从而有助于在相对完整的意义上揭示“西学”的学科门类。这也是梁启超《西学书目表》比《译书事略》的分类体系更具合理性、因而对后世影响更大的主要原因。但掘井思源,仍当以《译书事略》为近代第一部完全根据西方学科化原则为分类基础的目录。

综上,《译书事略》在中国近代目录学史上具有开创新分类的首创之功,后世西学书目皆受其思想、方法和原则之沾溉。但“前修未密”,以梁启超《西学书目表》为代表的后世书目既沿着《译书事略》客观主义之形式清单的方向继有精进,又结合中国传统目录学主体介入的方式,积极发挥识语、提要、序言的作用,表达宏大的社会政治文化诉求,具有明显的淑世情怀。

参考文献

- 张美平.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译书活动及其影响[J].中国科技翻译,2009(4):48-51,41.
-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96.
- 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二)[J].格致汇编,1880(6):9-11.
- 同3.
- 同3.
- 同3.
-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28.
-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218.
- 王韬.泰西著述考[M].长洲:王韬淞隐庐,1889:2-3.
- 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一)[J].格致汇编,1880(5):10-11.
- 同8:143-144.
- 王宗扬.江南制造局翻译书目新考[J].中国科技史料,1995(2):3-18.
- 贾步纬.量法代数[M].上海:则梅山房本,1872:书名页
- 金朝柄.康熙爱数学[J].文史月刊,2011(2):76-78.
- 贺枫.师夷长技以为师——以天津机器局的朝鲜学徒为个案研究[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4):147-154.
-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M]//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448.
- 严复.论世变之亟[M]//王栻,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1.
- 同3.
- 姜鸣.李凤苞[M]//沈渭滨,主编.近代中国科学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161.
- 李章鹏.“列国岁计政要”的翻译出版及其意义[J].统计研究,2015(9):104-109.
- 原付川,姚远,卫玲.《西国近事汇编》的期刊本质及其出版要素再探[J].今传媒,2010(5):104-106.
- 钱存训.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J].文献,1986(3):176



- 204.
- 23 徐维则.东西学书录[M]//熊月之.晚清新学书目提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叙例:4.
- 24 同10.
- 25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M].夏晓虹,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149.
- 26 同23:93.
- 27 同23:126.
- 28 同23:6.
- 29 同3.
- 30 同10.
- 31 同3.
- 32 林立强.明至清末译书书目的状况和评价[J].东南学术,1999(3):106—109.
- 33 同23:3.
- 34 同23:9.
- 35 同10.
- 36 同10.
- 37 同10.
- 38 同10.
- 39 李鸿章.上海机器局报销折[M]//顾廷龙,戴逸,编.李鸿章全集(第6册奏议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413.
- 40 同3.
- 41 孟昭晋.书业书目概说[J].青海图书馆,1982(3):45—48.
- 42 同25:1130.
- 43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M]//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三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90.
- 44 同32.
- 45 同8:404.
- 46 傅荣贤.论古代提要和现代摘要的文献观[J].图书情报工作,2016(6):26—31.
- 47 同25:1121.
- 48 同25:1125.
- 49 同16:455.
- 50 同10.
- 51 同10.
- 52 同10.
- 53 [美]班乃特.傅兰雅译著考略[M].哈佛: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1967:23.
- 54 同10.
- 55 梁启超.论译书[M]//变法通议.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64.
- 56 同3.
- 57 同10.
- 58 同8:141.
- 59 徐珂.清稗类钞(第八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4032.
- 60 同16:449.
- 61 傅荣贤.“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正诂[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8(4):53—56.
- 62 章学诚.校雠通义[M].王重民,通解.傅杰,导读.田映曦,补注.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126.
- 63 同16:499.
- 64 同10.
- 65 同10.
- 66 同16:449.
- 67 同10.
- 68 张增一.江南制造局的译书活动[J].近代史研究,1996(3):212—223.
- 69 同16:449.
- 70 赵惟熙.西学书目答问[M]//熊月之.晚清新学书目提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575.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扬州,225002
收稿日期:2018年1月23日

The Bibliography Interpretation of John Fryer's *Yi Shu Shi Lue*

Fu Rongxian

Abstract: *Yi Shu Shi Lue*, written by an English man John Fryer in 1880, is a translated and printed book catalogue of Jiangnan Manufacturing Bureau of Translation Center. It is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western book was catalogued independently, thus to complete the bibliography of the Western Learning and to identify Western learning as academic system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Learning. *Yi Shu Shi Lue* revealed the Western subject nature and the new direction of “driving today” and “winning ancient”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classification and other bibliographic elements, so as to become the precursor of Liang Qichao's “*Xi xue shu mu biao*” and other Chinese bibliography.

Keywords: John Fryer; *Yi shu shi lue*; Modern Bibliography

(接第87页)

Swans Spread the Wings: A Probe into the Citation Pattern of High Qualitative Publications

Carl J. Zeng Ronda J. Zhang Fred Y. Ye

Abstract: “Swan” phenomenon is a kind of special citation pattern in publications of high quality. It occurs when related highly cited papers appears in pairs, and the papers published early with scientific discoveries were White Swan and the paper published later with breakthrough finding and caused the number of citations of the early papers to decline is Black Swan.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representative publications of the Nobel laureates in Physics, Chemistry and Physiology or Medicine, in which we identify the White swan and the Black swan with using Swan Index. With combining scientific essence and citation data, “Swan” as a special citation pattern of high qualitative publications provides a type of quantitative ideas and methods to identify the high qualitative publications with breakthrough discoveries.

Keywords: High-qualitative Publication; Citation Analysis; Swan